

文韬武略忆元结

“元道州”“元容州”



元结

从鲁山这块灵秀之地出发,带着无限的崇尚和敬仰,穿越历史的光隧道,走入大唐,让我们翻开岁月的华章,去追忆文韬武略的英贤元结,重温他灿烂辉煌的人生经典。

元结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他是一位极富正义感,关心国家安危的杰出政治家,也是一位关注庶民疾苦的文学家。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元子,河南鲁山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历任道州刺史、容州刺史、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等职。因清德卓行,忧国忧民,诚信化人,勇冠谋略,政声俱佳,史称“元道州”“元容州”。

玄宗开元七年,元结生于河南鲁山商余山,少时“聪悟宏达,倜傥而不羸,十七岁始知书”,师从族兄、一代廉吏元德秀十年。29岁时,赴长安应试,立志报国。当时因奸佞当权,舞弊考试,使各地人才无一入选,元结愤然回到鲁山,归隐静养,耕作习文。天宝十二年,元结36岁再次应举并中进士,后又返乡,回到鲁山商余山赋闲,等候朝廷授官。

在元结静居家乡之时,安史之乱祸及中原。为免遭叛军的骚扰和屠杀,元结先后率领军民迁至湖北省大冶的猗玗洞及江西省瑞昌的濯溪,在那里耕田垂钓,读书避乱,并与邻里百姓结下了“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存”的深厚情谊。

乾元二年九月,唐王朝与安史叛军相持苦斗之际,受国子司业苏源明举荐,肃宗速召元结进京询问兵事,元结献上《时议》三篇,言辞虽然尖锐,但由于他巧妙地以灵武即位时的创业宏图激励肃宗,受到皇上赏识,提拔元结为右金吾兵曹参军,代理监察御史,令他到前线带兵平乱。

元结受命,迅速在唐、邓、汝、蔡四州招募义勇军,训练士卒,研究兵法。元结以民族大义为重,劝抚收编了高冕等人率领的“山棚”起义军,使手下队伍扩编至五千余人。元结先后率部扼守战略要地泌阳(今河南省泌阳县)数月,经过大小百余战,有效地阻遏了史思明的叛

军,保全十五座城市,为扭转南方战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因平乱有功,元结升为监察御史。

元结在荆南代理节度使时,任职八个多月,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代宗广德元年,岭南溪洞和西原的少数民族,因不堪政府的压迫而起义,猛烈攻打州、县,形势危急。代宗速下诏任元结为道州(今湖南省道县)刺(管理五县)。元结接到公文,立马动身赴任的时候,道州已被起义军攻破。

元结辗转崎岖山路,延至次年五月方才到任。道州原是有四万余户的都市,元结到任时已是户不足四千,人十不存一,残垣断壁,荒芜凋敝,混乱不堪的景象。经过一段时间走街串户的察访,严重的灾情更让元结痛心疾首。上任不到五十天,公案上就堆起了二百多封催征赋税的公文。封封标明“失其限期者,罪至贬削”。元结冒着丢官或被降罪的危险,舍身为民请命,请求免去道州百姓历年积欠的赋税获准。元结勤政为民,招致了结党营私、横征暴敛的宰相元载一伙的不满和忌恨,终于在代宗永泰元年夏,将元结罢免。

代宗永泰二年春,元结奉命再为道州刺史。两年多下来,元结采取一系列救世安民的措施,道州渐渐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元结行将离任时,沿途老百姓长跪不起,哭泣声淹,央求他继续留任,并联合向皇帝上书,请求为其建祠立碑。道州多处建祠,缅怀功德。自阳城始,于州衙傍专辟一街,名次山街,至今犹存。

代宗大历三年,元结调任容州(今广西容县)刺史兼本管经略使和容州都督衔。当时的容州,由于受安史之乱影响,加之横征暴敛,容州之瑶民纷纷聚首联合,奋起反抗,攻占容州达十余年之

久。元结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顾疾病缠身,义无反顾赴任。元结到任,面对容州的复杂形势,在走访调查缜密思考后,一改历任经略使对少数民族同胞惯用武力讨伐的高压政策,而是采用了抚慰劝励的方略。

元结饱读诗书,胆识过人,不仅精通为将之道,还熟知为人之道。他怀着一个安定团结的良好愿望,怀着一腔感动天地的悲悯情怀,不带兵刃,独身深入山区瑶寨,会见瑶族首领,晓以大义,劝勉抚慰,歃血为盟,以心换心。“六旬而八州定”,短短六十日,八个州就恢复了安定。这便是历史记载的“身喻蛮豪,绥定诸州,民乐其教,立碑颂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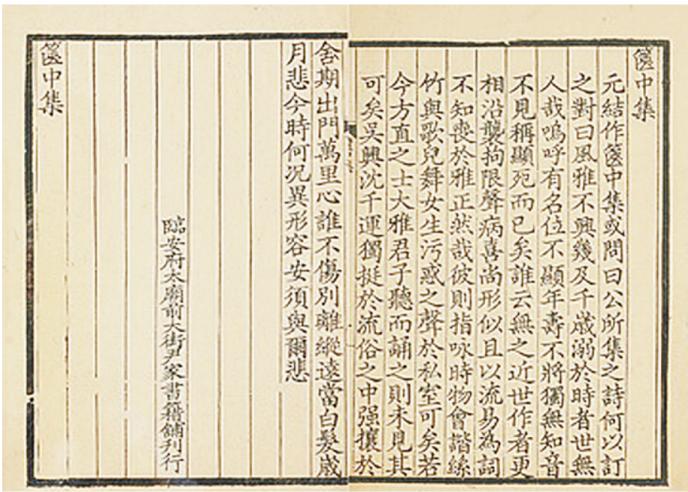
元结在容州任职一年,于代宗大历四年夏,因母亲逝世需扶柩回故乡守孝而离职。元结离开,全城民众纷纷涌进节度府请求他留任。元结离开容州后,民众自发捐款为其树碑立传,碑址遗存,现今完好。

代宗大历七年四月,元结守孝期满,奉召进京接受皇帝加授新职之时,不幸病逝于长安,享年五十四岁。

元结亡故后,灵柩被运回故土,安葬在河南省鲁山县梁洼镇青条岭下。好友颜真卿作《元结墓铭》,碑文评价:“率性方直,秉心真纯。见危不挽,临难遗身。侃侃令德,今之古人。”



后人为了纪念元结,依傍鲁山县城北的元结墓修建了元公庙。



元结《篋中集》局部

“次山之文不可不读”

元结的另一个人生亮点,便是文学成就。

元结青年时期已目睹了百姓溺毙、庐舍漂没的惨象,目击朝野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四伏,后来又亲历安史之乱,因此他提倡写作讽喻一类诗篇,企求诗歌能对社会产生补偏救弊作用。

元结的诗歌力求摆脱节律束缚,不事雕饰,绝少使用典故。既不同于盛唐时李白的夸张豪放,又不同于晚唐杜甫的怨天悯人呼天号地,元结心中深藏民众意识,与潮流士大夫的风花雪月不甚相同。

故此,元结的诗歌创作,反映民生疾苦,质朴醇厚,情感激愤,笔锋犀利,语言上多自民间口语提炼而来。他极力反对陈言,务去冷字僻词,力求浅显易懂,韵脚也较轻松自然,有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堪为现实主义典范。代表作《贼退示官吏》和《春陵行》两首诗,被欧阳修赞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诗圣杜甫诗赞“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谐华星”。

孔德先生在《元次山评传及年谱》中称:“次山虽好古,学古,不同于俗。而其文章亦有充分表现其时代精神者”,“具见次山经世之志”,“而俯仰忧国,忠君爱民,保全郡邑,抚绥流亡,有助于当时,非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诸诗人可比。”

孙望先生在《元结评传》则称:“元结在文学创作上反对绮靡浮华而提倡质朴淡泊的作风。他是继陈子昂而起的在文学观点与创作实践上发展着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勇猛战士。”元结抨击专写毫无社会意义的风花雪月与男女之情的颓废倾向以及“极貌写物”“喜尚形似”的模拟

因袭的风气。

李商隐为其文集作序说:“次山之文,其绵远广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移易之”,“其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并把元结提到与孔子比肩的地步,足见元结的影响力之巨大。后来史学界把元结看作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称赞其上继王勃、陈子昂而起,中与杜甫并肩努力,后为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开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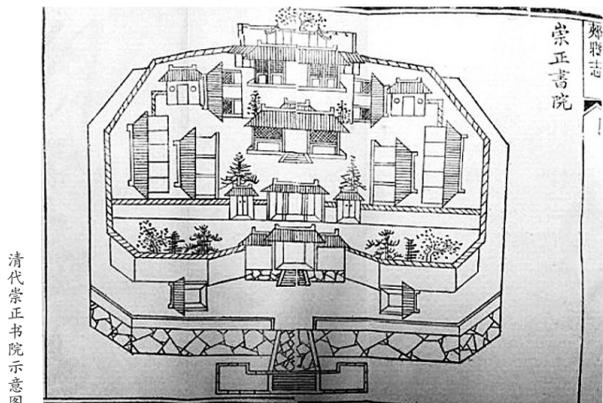
有史学家把元结的散文与柳宗元的散文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柳文简古、尚奇、理趣的特色实际上源于次山。

郑板桥在其《衙中寄友人书》中道:“次山之文不可不读,次山为人不可不学。”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文学史中,以元结为先锋,韩愈、柳宗元为主将的除旧布新的散文运动,对当时片面追求华丽辞藻,故弄玄虚,晦涩难懂的文风,的确起到了一种很大的冲击作用,它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视角更加贴近自然和民生,文体更易为劳苦大众喜闻乐见,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元结的游记体散文,也如他的其他诗文一样,以高古简约、平和清淡的风格构筑了其作品的美学基调,但又因其过分地学用古语,过分地强调政治教化,使其走入另一极端之境而影响了部分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效果。

元结是一位极具诗文造诣、有独特深邃思想、有刚烈而幽默个性的文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未得充分施展,令人惋惜。(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清代崇正书院示意图

崇正书院的前世今生

李国俊

1 高寺疑为郑敖之墓

郑敖北部,地势平坦,在记忆里,只有旧称崇正书院的高寺在一个突兀而起的大土丘上面矗立着,高寺的北面是一个小湖,显然土丘是取一旁之土堆积而成的,那又为何费工费力垒个大土丘呢?旧志谓:“县本楚公子郑敖封邑,其看台台遗址,即今之崇正书院也。”也就是说,崇正书院建造在郑敖的看台台遗址之上。这里真是看台台遗址吗?

楚公子郑敖,原名熊麋,是楚康王之子。前544年至前541年在位。楚国的都城在郢,而郢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距离河南的郑县可谓路途遥遥,怎么会在郑敖看台看台呢?所以说高寺是郑敖的看台台遗址,实为谬传。

再翻史书,《春秋左氏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栢(在今河南省禹州)、郑(在今河南省郑县)……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向王疾,缢而弑之。葬王于郑,谓之郑敖。”

郑县在春秋前期为郑国属地。但是到楚康王时代,即已被楚国占据。所以楚康王死后,他儿子熊麋(即郑敖)即位,不久,楚康王的弟弟令尹(官职名称)公子围就命弟弟公子黑肱和伯州犁在郑、栢和犇筑城。公元前541年十一月初四,楚国令尹公子围在伍举大夫的陪同下,前往郑国聘问。还没走出楚国国境,围就听说楚王——也就是他自己的侄子熊麋得病了。觐见君位已久的公子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遂命伍举大夫继续出访,自己则立即返回都城郢。公子围手持兵器,披盔戴甲,直闯内宫,支开宫人,径直来到自己侄子楚王熊麋的病榻前,解下头上的

冠纓,把楚王熊麋活生生勒死了。公子围即位,他就是那个穷奢极欲、昏暴之君楚灵王。说起楚灵王,大家或许不太熟知,但一定知道典故“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还有“晏婴使楚”中那个自作聪明的楚王就是他。

言归正传,周朝封建立国,王室及诸侯子弟皆有封邑,人死之后,一般要归葬封地。比如马服君赵奢,死后即归葬封地马服。但作为一国之主,熊麋死后应该葬于祖先陵墓,公子围弑杀侄子楚王熊麋之后,将他葬到郑敖,就是要贬低他的地位,不承认他的政统,所以把他葬在封邑,等于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宗室子弟。他意图用这种方式否定侄子熊麋的政统地位,进而显示自己继位之正言顺。君王死后都是要定庙号的,但公子围杀掉侄子熊麋后,却并没有给他定庙号,又因熊麋葬于郑,以于史家记事,只能称之为“郑敖”。所以,高寺疑为郑敖之墓。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公子围让公子黑肱和伯州犁二人在犇、栢、郑三地筑城池。因为临近郑国,这三地原本就是郑国的土地,自然派人筑城防御、重兵把守。因此,筑土台也许是用来防御外敌的工事。

2 曹豹与崇正书院

至于土丘上的书院建于何时,因时间久远,修废举坠,其始莫考矣!只知“郑古有书院名”。省志谓“郑之为县,自汉始”。书院之称,往往起自唐宋。史载:“元朝天顺年间,为僧所据,改为高阳寺。”前令相袭,故有“高寺”称谓。

讲崇正书院,必须提到一个历史人物——曹豹。弘治十二年进士,授河南郑县令。他倡修县志,将高阳寺重新复名为崇正书院,聘饱学之士为师,一时学风大盛。

据志书记载:“崇正书院,在城东北隅,祀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两苏氏,旧为高阳寺,弘治中,知县曹豹,改崇正书院。康熙中,知县陆次云重修,复立老苏祠,以二苏配。”

据《崇正书院记》记载,崇正书院当时的规模结构是:“宏其规制,立门宇,建七贤祠。中为讲堂,旁起斋舍,计十有九楹。斋之后,左聚奎亭,右游息所,计六楹。”楹作为量词,是计算房屋多少的單位,一列为一楹。可以想象当时崇正书院规模之恢宏。



在崇正书院原址上新建的北街回民小学



该幅油画描绘的是解放军攻下高寺(旧称崇正书院),俘获国民党十五师师长武庭麟后军民欢庆的场面,现张贴在郑县烈士纪念馆。

3 七贤祠与郑县名士

崇正书院内的七贤祠里供奉的七贤指周子(周敦颐)、二程子(程颢、程颐)、张子(张载)、朱子(朱熹)、两苏氏(苏轼、苏辙)。此七贤“上洗汉唐章句之陋,下开昭代文明之雅”,皆为忠节大贤饱学之士,但七贤和郑县到底有什么渊源呢?

由各地立祠的历史规制来看,当地祠堂里供奉的都是和本土有关联的人士。郑县距当时都城汴梁不远,又在汴梁至洛阳的古道上,达官显贵来去往往也属常态,为何偏偏供奉此七贤?有人说此七子曾在崇正书院讲过学,万历年间郑县知县山东人王策重修七贤祠后写了一篇《重修七贤祠记》,上书“七贤者,周、程、张、朱、眉山兄弟也。数君子虽非郑产,然先后寓止于郑,故郑人修之盛事,尸而祝之至今。”“寓”字之意原指寄居,后泛指居住。这或许就是他们和郑县的渊源吧!

对于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禹州的李清源认为,眉山二苏和郑县密不可分,二程去郑县讲学倒有可能,程颢当过汝州团练推官,程颐监过汝州酒税,“程颢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五十岁。寓颍昌”就是程颢在颍昌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的颍昌包括郑县的一部分。而朱熹是南宋人,而那时郑县已归金国,他怎么可能跑到这里来讲学?他认为《重修七贤祠记》上书“寓止于郑”是谬说。周濂溪和张横渠年谱里都没有提到去过郑县,所以供奉他们,可能因为他几个是理学代表吧!

崇正书院自古迄今,都是郑县“藏典籍教国人的场所”,清光绪三十二年“官立师范传习所”在崇正书院创办、民国初年的高等小学堂也由龙山书院迁于此。这里人才辈出,仅明清时期就有郑县名士李愚庵、魏谦六、刘大来、高三畏等,民国的牛子龙、王庚彤、袁金鉴、张绍源、白铭、张景哲等均在崇正书院读过书或讲过学。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4 战争岁月里的崇正书院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崇正书院也饱受战火洗礼,据马泰山先生所写《崇正书院》一文中记载:“一九四四年,郑城陷入日寇之手,日军看这里地形很好,就以此作为驻军点,把后台大柏树顶砍去,在上面建瞭望台,与北城门形成犄角,以控制城北的丘陵地区。”

1947年11月4日,经十小时激战,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第

4纵队10旅攻城破池,生俘了龟缩在崇正书院的国民党十五师师长武庭麟等人,将五星红旗插上崇正书院的最高点,标志郑县从此解放。

崇正书院,历经千年风云,朝代更迭,它见证着郑县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郑县人民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